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软实力研究』丛书 胡键◎主编

作为制度软实力的民主

——马克思革命框架中的民主思想研究

徐圣龙◎著

SOFT POWE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软实力研究』丛书

胡键◎主编

作为制度软实力的民主

——马克思革命框架中的民主思想研究

徐圣龙◎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序

这里要送给读者的是关于软实力研究的系列。出版这几本册子的缘起大致在于：自 2005 以来，本人一直在从事软实力理论研究。2008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经过 4 年的辛勤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最终成果以《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方略》（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出版。2014 年，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这使我及我的团队不得不对该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实际上，早在 2009 年，我就向我院领导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软实力研究的机构或平台。但是，或许是对该问题认识上的偏差而最终被搁置。当然，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相反，研究在不断深化，否则，不可能在该问题上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本团队开始把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样形成了不少相关成果，包括“一带一路”的话语研究，“一带一路”的国家创新力研究，“一带一路”的风险研究等。实际上，就本人而言，早在 2007 年前后就已经在从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2008 年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有关“大陆桥”经济研究的项目评审，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经过数年的研究和积累，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2015 年年底出版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一书。2016 年 12 月，国家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提出重视“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种观点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全球化方案，是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等等。这使外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畏惧感，甚至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加强“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可以纠正相关的错误认识。鉴于此，本团队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研究“一带一路”和软实力的关系，因为，“一

带一路”的“互通”，基础就是民心相通，而跨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的有效路径。

2017年3月，在经过反复汇报、请示以后，我院终于同意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3月17日，中心揭牌仪式暨“一带一路”软实力论坛召开。而在此之前，本团队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支持，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这样，我院软实力研究的团队建设、机构建设暂告一段落，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数据收集、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之中。

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着“美国衰落论”，这主要是因为70年代苏联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态势，与美国在第三世界全面争夺霸权，而美国则长期陷入越战“后遗症”之中。所以，“美国衰落论”似乎得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接受。然而，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没有衰落，而是权力发生了扩散，从硬实力扩散到软实力。因此，奈建议，要充分认识软实力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在美国的对外行为中要大力推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奈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他的认识无疑是前瞻性的，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软实力的确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之一。虽然“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但对软实力的关注、运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易经》中就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德厚方能承载万物。这实际上就是软实力。《道德经》也有相应的论述。如“天下之至尊驰骋于天地之至坚”“上善若水”等。这些都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即便是关于运用军事硬实力的《孙子兵法》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手段。由此可见，软实力并非是外来的东西。

关于软实力的来源，奈认为是来自文化、价值和对外政策。同时奈也强调，有形的物质性资源也可能产生软实力。后来被一些学者解读为软实力必须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这个认识既对也不对。当把软实力与

大国成长的关系来看,即国家的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离开了硬实力,软实力也就失去根基。然而,如果纯粹从学术角度来看,软实力不一定需要硬实力。例如,罗马帝国、古希腊都不存在了,但它们的文化、价值迄今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始终有影响;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苏联对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乃至东欧国家的影响依然存在。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已去世了,但他们的伟大思想依然影响着世界;老子、孔子、孟子也早已作古,但他们的思想却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关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要区别具体情况。

软实力的内涵

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但缺乏理论论证,因而其理论缺陷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研究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学术界,但最初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概念的“原产地”美国对此应者寥寥,而在中国最初对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并没有放在重要位置,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发展即硬实力。当然,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的确也兴起了一个“文化热”。但是当时整个国家为了解决“短缺经济”问题,尤其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文化热”迅速被经济发展的势头所掩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经济的热潮更是把经济之外的一切都遮盖了。其结果是,经济迅速崛起的时候是文化的日益贫乏。

进入21世纪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大重视,强调增强国家软实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从党和政府的文件还是国内学术界来看,中国语境中的软实力与奈所说的软实力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换言之,国内学术界所研究的软实力其内涵要远远大于奈所说的软实力。国内学术界所使用的软实力只是借用了奈的软实力的外壳,其内涵则完全“中国化”了。就其内容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由文化、价值观等无形资源产生的软实力。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不过,文

化资源要成为软实力还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更需要一种转化的能力。也就是说,文化资源大国并不一定是软实力大国,更遑论软实力强国。

二是物质性即有形的资源产生的软实力。虽然奈也有此观点,即有形的资源本身也会产生软实力,如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美国拥有最发达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美国一直就对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长期来,美国一直就是世界优秀青年的移入国。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物质性资源。又如,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科技实力也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中国也对世界各国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相当多的欧美各国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来中国创业和选择中国定居。这就是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强大软实力。

三是制度资源产生的软实力。这主要是指好的制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也会使制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这里所说的制度既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也包括工作中的运行机制,但我们研究的制度更多的是指前者。

制度作为软实力并非是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的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古今中外都不断在探索国家制度,目的是寻找制度的力量,包括制度的生产力、吸引力。《马可·波罗游记》传到欧洲后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可·波罗在东方看到了一种比西方更好的制度,或者说是中国的制度对他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后来,门罗尔萨、莱布尼茨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最好的帝国。这是当年大元帝国的制度对欧洲产生的巨大软实力。

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震醒了中国一批先进分子,使他们进行反思。最初是器物上的反思,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在器物上的反思。及至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再次战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制度反思,寻找一种能够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并能够实现富国强民的制度。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百日,但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制度反思,寻找适合中国且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寻找一种美好的制度。当然,这些实践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的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从此,对制度的

探索,就不可推卸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偶然的,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软实力。过去4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了创造世界现代化奇迹的“中国道路”。

为什么要研究软实力?

对某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更是服务实践的需要。从实践发展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不仅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而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甚至可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并在此基础上人们正在追求一种高质量的幸福生活。但是,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既包括对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更包括对文化等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而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软实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正是这样的客观实际促使我们必须重视软实力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有了新的认识,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活质量和文化生活质量的双重提高。只有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缺乏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这种生活绝对是没有品位的生活,而没有品位的生活也绝对算不上美好生活。而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则是以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基础的。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形,既表现在中国发展存在着的严重二元现象,也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上。换言之,无论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都离不开文化发展和大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由此可见,中国要在解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就是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大力增强国家软实力,谋求中国文化发展,朝着人的自由的重大进步。

从服务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以至于经济发展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现陷入增长瓶颈的迹象。这些问题虽然出在经济上,但解决问题的入口却在经济之外,具体而言是在文化上,即劳动力素质、产业素质上面。古人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并不能直接让人“知礼节”“知荣辱”,提升人的素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教化。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经济等硬实力的增强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定软实力,但真正要使国家软实力的整体性提升,还必须要有专门的增强战略。反过来,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则会对经济等硬实力的提升产生倍增作用。也就是说,软实力发挥得好一定是硬实力的增进器。而且,也只有当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时候,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二元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消除,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才有可能消除。

此外,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新型大国。之所以称为新型大国,就是因为中国崛起的方式、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都与西方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不一样。从崛起的方式来看,中国是和平崛起,即使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而不是像西方大国那样是纯粹意义的硬实力的崛起。单纯的硬实力崛起最终就很难避免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来看,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即中国强调和平、合作、共赢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关系,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来看,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有限参与,最后到全面融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最初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建设者:一方面现行的国际体系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且受西方大国主导,其不公平、不公正性显而易见,但自从中国加入其中之后,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处理并在其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另一方面,中国用中国智慧来加以改革。40年来,中国不仅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而且中国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浓缩成为对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价值”。特别是当今中国已经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央区域,“中国价值”也毫无疑问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认

知,最后会在“中国价值”的积极效应之下而不得不接受“中国价值”。从这一方面来看,加强中国软实力研究必然会产生世界性意义。

怎样研究软实力?

正所谓研究有法、研无定法、贵在得法。对任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研究方法。约瑟夫·奈研究软实力的方法绝对不能用于中国的软实力研究。尤其是他研究软实力的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文化,对全世界用美国的价值观进行改造。由此可见,尽管奈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且以文化为内容的软实力强调的是一种认同性力量,但奈显然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段来向世界推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奈对自己的判断是恰如其分的。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软实力的目的显然与奈是大相径庭的。中国视野中的中国软实力目的是用文化来滋养国民,提高中国的品味,从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健康、良好的中国形象,而绝非是要用中国文化来改革世界。诚然,中国也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也是为了加强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绝对不是用中国文化来同化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一直强调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的客观事实,而全球化一度被西方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甚至全球化一度被视为是“消弭东方”的“西方化”趋势。然而,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那种趋势完全是西方的错觉。虽然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来看,“西强中弱”依然是客观实际,但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而必将获得世界的青睐。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陷入的困境也昭示着西方文化的困境。而与此相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可谓“这边风景独好”,这也正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在当今世界正闪烁着熠熠的光辉。这种情形将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西方的困境将促使西方不得不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摆脱现实困境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尊重多样文化,谋求共同发展。

当然,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对中国文化树立足够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难以正常地开展跨文化交流。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也就

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以共，天下大同”。意思就是，既要正确对待本民族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在文化多样的前提下实行文明互鉴，文化融合，最终走向人类的大同社会，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研究中国软实力就是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智力支持。

丛书主编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研究”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前言

在文化之外,制度也构成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民主的国别实践和比较、民主的话语权争夺、民主方案的输出等,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民主制度建设成效直接影响到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竞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言,主动追溯其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进中国民主软实力建设、贡献民主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无疑是构成中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厘清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科学内涵,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升中国民主制度软实力建设,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国外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否存在民主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有不少学者肯定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存在。但是这也是从批评的角度展开的,并最终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纳入极权主义民主的脉络。当然,不排除一些国外学者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所作的辩护,只是这些辩护多数落入自由主义民主的谱系,要么一味否定马克思有关暴力、专政的论述,要么通过自由主义民主重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可见,国外学界在马克思民主思想问题上还是存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在于,不管是肯定抑或否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其提供的理由和证据都是不充分的。一方面,国外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逻辑结构之中,即唯物史观以及相应的革命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国外研究也容易忽视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语境,即作为革命年代的19世纪,以及相应的民主在当时所具有的革命内涵。

与国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不同,国内在马克思民主思想问题上基本

目 录

导 论

- 一、研究缘起 / 001
- 二、马克思民主思想及制度软实力研究现状 / 003
- 三、研究框架 / 057
- 四、研究方法 / 060
- 五、研究创新及不足 / 065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入场 / 067

- 一、哲学革命:实践为中介和基础的主客体统一 / 071
-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分工为中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 / 097
- 三、革命的历史逻辑表达:反思为中介的实践与认识统一 / 111
- 四、小结 / 120

第二章 革命框架中的专政、暴力与民主 / 122

- 一、革命与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 / 124
- 二、专政的二重属性 / 138
- 三、暴力的单一属性 / 144
- 四、民主的二重属性 / 150
- 五、革命与专政、暴力、民主的复杂关系 / 157
- 六、小结 / 163

第三章 无产阶级革命路径的民主选择 / 165

- 一、马克思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向 / 167
- 二、革命高潮与被掩盖的民主 / 178
- 三、革命退潮与马克思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 / 194
- 四、小结 / 207

第四章 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主形式 / 209

- 一、组织原则对于组织形式的约束 / 212
- 二、组织形式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 / 219
- 三、如何对待反对派：对组织原则的重申 / 229
- 四、民主在未来社会组织中的转向：假设与推论 / 239
- 五、小结 / 243

第五章 马克思民主思想的演进及反思 / 245

- 一、列宁与伯恩斯坦：马克思之后民主演进的不同路径 / 247
- 二、结构之内与结构之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 / 264
- 三、小结 / 279

第六章 马克思民主理论对中国民主建设的意义 / 281

- 一、民主的一般性 / 285
- 二、民主的阶级性 / 291
- 三、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性 / 299
- 四、民主形式的重要性 / 306
- 五、小结 / 314

结束语 马克思民主思想与中国民主制度的生长 / 318

参考文献 / 328

后记 / 354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民主作为制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不管是对于美国的民主输出,还是中国贡献自身的民主方案,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都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除了基于国情的实践考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即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论支撑。发掘经典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科学内涵,对于民主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言,都是必要的。这也是加强中国民主制度软实力建设的题中之义。因此,笔者以民主这一制度软实力为出发点,展开对马克思民主思想内涵的研究。

国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主要基于阶级属性的视角,即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社会达到更高的发展状态这一逻辑。并且阶级分析结构贯穿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理论之中,包括革命、专政、暴力、阶级、国家等。这一分析方法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逻辑起点,但是其可能忽略了马克思自身对于政治问题包括民主思考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马克思在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与之后其他人对其的诠释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对立。这并不是对之后的诠释作任何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而是承认马克思与马克思的诠释者之间的差异这一事实。换言之,马克思所阐释的民主内涵有其特有的时代语境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之后的诠释者同样也有回应时代的挑战和本基本的分析结构,正统性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正是基于这一有意无意的忽略,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给人留下了只重视阶级斗争和暴

力革命的印象,缺乏丰富的民主思想。而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辩护则囿于阶级的分析框架,只承认无产阶级的民主、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另外,国外一些学者在马克思民主问题上的肯定态度,同样陷入对立思维之中,更多地从后来民主发展的状况去论证马克思的民主思想,而没有直接指向民主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被赋予的内涵。因此,如果要提供在阶级民主之外有关马克思民主的新的内容,如果要避免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那么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从历史语境与逻辑结构的视角,探析马克思在民主问题上具体而复杂的态度——这一态度来源于对时代的回应和自身的分析框架。

另外一个在马克思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趋于哲学化。就马克思自身而言,消灭哲学以及对哲学的革命在19世纪已经提出,并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正是建立在由哲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分析才是其关键所在。如果回避政治问题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哲学的反思或批判就会显得越来越远离马克思的初衷。实践的观点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命题,甚至其本身就是对哲学的否定,其更多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是现实中的行动问题。正如雅克·泰克西埃所指出的:“在我以前的研究中,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而是他们的文章或短小作品。在这个理论和学术性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我看来首先是政治作家,对吗?在这项研究之后,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信,应该这样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这是有好处的”,“如果我能使读者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政治思想家,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创造了一些政治概念,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思考一个时代的问题”。^①从泰克西埃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实践者和行动者,其理论体系是政治实践、行动在理论层面的表达,如果一味强调马克思哲学层面的研究,那么其必然与马克思理论体系出现较大的偏差。尽管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之间可以出现差异,但是随着时代主题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这种偏差容易产生抽象、教条的结

^① [法]雅克·泰克西埃:《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姜志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果。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研究,包括民主思想,就显得非常必要。这种研究应该从马克思的自身理论体系出发,而不是回避马克思在实践及政治行动上的态度。

最后,有两位学者的两部有关马克思政治思想包括民主思想的研究,促成了笔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的兴趣。一本是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其提出了在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过程中,首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方法论的问题,尽管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论述马克思民主思想的部分。另外一本是雅克·泰克西埃的《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作者将马克思的民主问题与革命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考察,在民主存在的地方,决不能忽视革命与之的关系对于民主内涵的重要作用。泰克西埃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从马克思自身出发,而不是从之后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的诠释者理论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即吴恩裕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不过,泰克西埃的不足在于,革命与民主的关系仍然没有清晰地表现出来并贯彻于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解过程中。这两位学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阶级民主、马克思哲学等范围,而是尝试在马克思的逻辑结构中还原其本来意义上的民主内涵,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以及之后诠释者的思想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笔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也是基于这一基础上的尝试。

二、马克思民主思想及制度软实力研究现状

(一)国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

国外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可谓纷繁复杂,涉及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人物,但是就其观点而言,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否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另一类则是肯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在此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否定和肯定的观点,尤其是其分属不同的分析路径,即流派问题。同时,考虑到国内对于国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的译介和研究,笔者主要选取一些在国内较少涉及的人物及其观点,对于较为大众化

的人物,则略而不论。当然,这类大众化的人物及其观点,即使具有代表性,也是可以归入选取的人物及其观点的脉络之中,他们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解上存在较多的相似性。

1. 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否定

(1) J. L. 塔尔蒙(J. L. Talmon)的“极权主义民主”叙事

塔尔蒙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纳入极权主义民主谱系,其认为,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认识,并不在于否定其存在,如“在主张自由价值的同时,反对并否定另一种民主制度”那样;相反,其关键在于不同民主制度“对政治所取的不同态度”^①。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民主的组成,但是这一民主理论属于极权主义民主思想,根本上又是否定民主、反对民主的。

塔尔蒙之所以有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划分,其认为:“自由主义趋向于从事政治事务时采取反复尝试方法的经验主义,并且把政治行政系统看作实际实施人们自发的贤明行为的机构。自由主义还承认基于各种水准和标准的各种个人或集体的努力,包括和政治圈外非主流派别的各种政治活动”;相反,“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流派,它的理论主要建立在采取承认唯一和排他的政治领域的真理基础上。在意识形态上,它是持一种可以被叫做政治救世主义必定会降临的信念”^②。那么这种民主类型的出现,原因何在呢?塔尔蒙认为,主要在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即“欧洲传统秩序衰退的结果”,“宗教已经不被知性及情绪所支配了,僧侣等级的封建制度,由于受到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要因的冲击而崩溃了,而且迄今为止的以门荫身份为基础制度的社会概念也被抽象的、个别的人的理念所取代”。^③这时,“社会决定论”流行起来,这意味着“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得不接受的东西”。^④另外,伴随着宗教权威的衰退,“除了国家,便没有道德的源泉,也没有道德认可的标准……政治理论和伦理标准不能完全分离”^⑤。最后,财产问题也被纳入救世主义的先决条件中去,“以道德为前提的教义转变成以社会经济为主的理论”,

①② [以]J. L. 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③④ 同上,第4页。

⑤ 同上,第5页。